

后还声明：“当然我们并未找出影响生育率的全部因素，其他尚待探索的原因中显然还包括一些难以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

1992年前，在我国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不少人口学者撰写的文章中往往不注意低出生率与低生育率的区别，把建国后第三次出生高峰称为“生育高峰”。为此，查瑞传教授专门撰写了论文《我国第三次出生高峰不是一次生育高峰》，并在《人口研究》1991年第3期上发表。该文指出：我国建国后第一次、第二次出生高峰时，因当时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都比较高，所以可同时称为“出生高峰”和“生育高峰”；而建国后第三次出生高峰的总和生育率均在3以下，所以“只能称之为出生高峰，不是生育高峰”。后来在查老师晚年接受《中国人口报》记者夏京京采访时说：“你可不要小看这一字之差啊。只有分清了这差别，我们才能对症下药，争取工作上的主动，所以说，理论研究不能有半点模糊啊”（《中国人口报》，1999年9月6日）！

针对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人们往往认为生育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生育的数量、生育的时间（包括初育年龄和生育孩子的间隔）等情况，《人口研究》1992年第6期发表了顾宝昌教授的论文《论生育和生育转变：数量、时间和性别》。该文首次提出了“生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兼有三个特征：即数量、时间和性别。换句话说，任何生育都是一定数量、一定时间和一定性别的生育。我们把它称为生育的‘三维性’”。作者认为考察生育转变应从这三个方面去考虑，而不应该只说成是一个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否“彻底实现了生育转变”，必须看它是否“实现①从多生到少生，②从早生到晚生，③从性偏好到无性偏好的转变”。以后顾宝昌又在《综论中国人口态势与实践的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中，把生育的性别扩展为“生育的质量（性别、健康和智力）”，使其的生育转变“三维性”理论表述得更全面。

随着我国人口研究和计划生育工作中更广泛地使用“总和生育率”这个人口统计的指标，该指标的局限性和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为了使大家更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总和生育率这个指标，《人口研究》2000年第5期发表了郭志刚教授的论文《总和生育率的内在缺陷及其改进》。该文指出：总和生育率的第一个缺陷是“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背离”，而“这种背离产生的原因是婚育年龄的变化，或者说是队列的年龄别生育模式的改变”。总和生育率的第二个缺陷是“不能控制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即“没有容纳育龄妇女的曾生孩子信息，也就不能控制曾生孩次这种结构影响”，在比较孩次结构差别较大的年份或地区之间的总和生育率时，不能区分其差异到底出于生育水平不同还是孩次结构不同。作者认为Bongaarts和Feeney在1998年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是改进总和生育率第一个缺陷的较好方法；Feeney在1985年和马瀛通在1986年分别以不同思路创建的“孩次递进生育指标体系”，是改进总和生育率第二个缺陷的较好方法。

总之，上述几篇论文只是我感受较深的几个事例。《人口研究》创刊30年来发表了许多人口理论创新之作，它对繁荣发展中国人口科学和培育支持中青年人口学者成长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人口科学史册。

《人口研究》发展过程的启示

郭志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中国计划生育经历了30多年风雨历程，中国人口研究也经历了恢复初创到繁荣的过程。两个过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在这两个过程中，《人口研究》杂志在传播、交流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恰逢《人口研究》正式创刊30周年，我作为长期从中受益的读者和作者，向《人口研究》杂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口研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这是一笔宝贵财富，非常值得人口学者不断加以

总结和汲取。借这次学术论坛,我想就中国人口研究、特别是生育研究方面,谈谈个人感想。

1 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和反思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成为今天人口研究人员的共识。然而,在中国人口学发展的早期,人口研究也曾受到当时教条主义盛行的很大桎梏。那时,老一代人口学者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理论束缚下开始探索人口学规律、传播人口学知识的,并最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尽管今天的人口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当时的水平,我对老一代人口学者仍怀有深深的敬意,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是建立在他们奠定的学术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他们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追求真理的风范。

今天的研究条件比30年前有了极大的改进,研究领域更广阔,研究经费更充分,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先进,研究人员的自由度也更大。但是,学风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做研究就需要学者自己把持自己,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作为中国人口学的后来者,我们应当将老一代人口学者的奉献精神 and 求真务实的风范传承下去。

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总是在一定局限条件下开展研究工作的,这种局限既包括外在研究条件的局限,也包括我们自身的认识局限。此外,还有来自社会方面的种种干扰和影响。所以,仅仅研究条件的改进并不能保证人口研究结论总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和把握常常并不能一步到位,往往需要经历一些曲折。所以,我们很需要在科学实践中对中国人口的历史、当前状况、以及未来前景不断地加以反思、深化认识。力争使我们的认识尽可能地正确反映客观实际,进而形成恰当的决策和行动。

2 回顾生育研究及有关影响

19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使当时很高的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这种成绩助长了对政府行政干预能力的迷信,而控制人口的迫切需要导致计划生育方面倾向于要求更严和急于求成。然而更强的行政干预并没有获得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反而引发了许多社会不良后果和相应的批评建议。1984年进行了“开小口子”、调整生育政策。但是由于思想上并没有取得一致,行动上也欠步骤,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一些混乱和局部失控。与此相应,总和生育率在2.5左右徘徊。这种局面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逐步稳定下来。应当说,虽然我们现在拥有大量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历史文献和统计数据,然而无论是对1970年代生育率大幅下降还是对1980年代生育率上下徘徊,都尚未来得及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许多认识至今尚不统一。但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政府和学者都开始认识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也要遵循客观规律,并且这里所说的规律决不仅仅是人口统计学规律。另外一点经验,就是做人口规划时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进入1990年代后,生育率又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再一次出乎人们的预料。1992年全国生育率调查表明生育率首次直落更替水平以下,直接引发了对出生漏报问题的强烈质疑。然而,后来更多的调查结果反复表明,当时的生育率的确发生了大幅度下降,并且在整个1990年代中保持持续下降。

2000年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23。尽管我们知道这一结果脱不了出生漏报的干系,但我们始终并不知道出生漏报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学者们对2000年普查的人口总数与结构心存怀疑,而且对生育水平的看法差距很大。尽管主流观点认为2000年时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8左右,我于本刊2004年第2期和第4期撰文提出,从1990年代调查揭示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和生育年龄提高的幅度来看,即便已经考虑了18%出生漏报影响,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处于1.5以下的可能性很大。

鉴于种种条件限制,确切的生育水平一时半会的确较难搞清楚。也许,我个人对生育水平的估计过于乐观。但是,“统计”毕竟不是“会计”,并不需要准确到分毫不差,我们仍可能也需要对当前生育水平有大致把握,特别是对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的大趋势要大致把握。因为这不仅仅是一般的学

术争论,而且关系到当前工作和未来规划。过去面对较高生育率,做人口规划时要加上一些余地,但这种就高不就低的工作习惯已经不适应今天的低生育水平。我的上述论文旨在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注意,不要忽视极低生育水平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人口规划中不仅要在较高生育一端加以保险,而且也要对较低生育的可能后果加以考虑。

时过境迁,我们又拥有了更新的调查数据。无论是2005年全国小普查,还是2006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统计结果都并未推翻上述我对2000年生育水平的观点。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估计中很可能对极低生育的前景考虑不足。

3 当前生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科学研究应当在一个较宽松的条件下进行,应当立足于大量观察资料的分析与综合,应当经过充分的学术交流与讨论。生育水平的人口统计研究也不例外。

在当前急速的社会变革中,中国人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从人口研究者的角度,需要不断地拓展视野、努力学习、认真研究。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思想局限会束缚自己的学术研究。

从前所述,30年来我们对生育前景的估计并不能很好地符合实际发展进程,正是因为我们对当时的生育状况及其形成原因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另一个例子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研究。19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然而,这方面研究受到强大的行政干预,并没有充分开展起来。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出生性别比失调变得更严重,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者的密切关注,于是又涌现了相当一批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正逢1992年生育率调查后对出生漏报的强烈质疑,这种基本认识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对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研究。因此,1990年代的主流认识是将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归咎于出生女婴漏报。然而在2000年人口普查以后,更多的人开始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并不是假性统计问题,而是确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是,10年的耽误也使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又进而飙升到120的水平。

这些例子都表明,认识从现象到本质,除了受数据与分析方法的局限以外,还会受很多其他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影响。

生育水平统计是各种复杂因素导致的结果。有时,我们感到难以理解所得到的生育率统计结果,很可能是因为忽略了某些重要解释因素的存在。当总和生育率很低时,既可能由于出生漏报,也不能排除终身生育水平的确在降低,还有可能是因为婚育年龄推迟而产生了生育空档(专业术语称之为“进度效应”)。当总和生育率突然大幅回升时,可能是计划生育工作失控,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产生了出生堆积,甚至有可能是调查样本偏差所致。在研究工作中,个人经验和主流认识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也要时时重新审视和反思,不然研究工作同样会出现日常生活中常有的心理学选择现象,即“不想看的时候就会看不见”。科学研究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实践活动,目的不明确的研究当然就容易劳而无功。

科学发展史中能够清楚地看到新老研究范式的更替。所谓研究范式就是一种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体系。在科学发展中,当一种范式适合于所处的发展阶段时,它就会有有力地促进科学发展。但是当科学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时,原有范式就会落伍,反而成为科学发展的桎梏,新的范式就会应运而生。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观点与方法与时俱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仅要努力,而且要不时地自我检讨、自我反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跟上历史发展。

为了推进生育研究,就要认真思考,拓宽视野。否则,就会在研究中先入为主地忽略了一些重要方面。同时,还需要努力学习和掌握新的分析方法。在统计分析中,所有的指标和模型其实都服务于展示事物的不同侧面,它们就是解决过河问题的桥和船,不掌握它们就很难过河。对于不同指标和不同模型结果,我们必须下气力正确地理解其意义,否则就会出现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混乱。

近年来,我曾经用各种不同生育指标来研究生育水平,用以展示不同方面的影响。但是,我注意

到一些论文或研究报告将近年不同学者计算的不同生育率都列入表格进行概括,其中也包含我计算的递进生育率、去进度效应生育率。我需要说明,这些不同的生育指标表达的是不同的内容,虽然将它们之间相比有反映相对差别、突出某种因素影响的意义。但是,如果将这些指标值都作为当前生育水平的估计则很不妥当,是一种概念混淆。目前人口统计中仍然以 TFR 作为当前生育水平的概要指标,而不论是年龄递进生育率还是间隔递进生育率尚未得到普及应用^①,而去进度效应生育率则根本不是当前生育水平指标,而是根据当前生育情况反映出来的队列生育估计^②。特别需要指出,以上所说的这些不同生育指标都完全不承担修正出生漏报的功能,我应用这些生育指标的分析只是为了揭示,除出生漏报外还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常规总和生育率很低。

关于当前生育水平存在着差别很大的多种估计,我相信这会随着学术交流和更多信息的取得和研究而逐步趋向一致,因为我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觉得还应该指出,民主集中制虽然是政治生活和实际工作当中的原则,然而科学研究却只服从实践检验真理这一终极法则。这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不能用于判断一种认识是否正确,而判断一种认识是否正确只能根据科学性原则,即论证逻辑(即方法和模型)是正确的,事实依据、假设和推论结果要符合客观实际。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根据对论证逻辑的检验来做接受或拒绝其结论的初始判断,这仅仅是因为论证逻辑检验的成本较低。然而,这完全不能取代客观实际对认识的检验。所以,就是当论证符合逻辑的条件下,假如事实依据或假设条件脱离了实际,所有在此基础上的推导和结论也就很难符合实际。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且,实践检验并不是一劳永逸,而是必须要反复进行的过程。这些都是认识论和多年实际人口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4 小结

综上所述,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是经过研究人员认真钻研却产生错误结论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这是因为,有时我们所能利用的数据是有缺陷的,有时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不恰当的,有时我们会受到自己思维定势的限制,有时我们会受到外部舆论或行政干预的过份导向或压力。因此,在个人的研究中产生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甚至一种错误认识在整个学术界中成为一个时期的主流也是难免的。这时,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讨论对科学研究发展总是有利的。在学术交流中,还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观点,因为少数人的观点转变为主流观点往往正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执这种观点,而是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和事实根据。

开展学术活动 促进学术繁荣

——写在人口学会会刊《人口研究》成立 30 周年之际

张敏才(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

《人口研究》创刊 30 周年了,岁月匆匆,不知不觉进入了“而立”之年,有幸看到《人口研究》创刊、成长,成为中国期刊方阵期刊、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我在中国人口学会秘书处工作期间,《人口研究》作为中国人口学会会刊,为繁荣学术活动、推动学术创新、加强学会建设发挥了她应有的作用,我对《人口研究》更多了一份感激之情。

正如人生到了而立之年一样,《人口研究》经过了 30 年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个性:

首先,她是一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口学期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着办刊的宗旨和方

① 由于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的影响,递进生育率计算值有可能与 TFR 计算值存在显著差别。

② 它与常规 TFR 之间的差代表着本时期婚育年龄变化的影响。